

***Borderland Capitalism: Turkestan Produce, Qing Silver and the Birth of an Eastern Market.* By KWANGMIN KI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viii, 312pp.**

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歷史系助理教授金光明(Kwangmin Kim)2016年出版的*Borderland Capitalism: Turkestan Produce, Qing Silver and the Birth of an Eastern Market* (《邊地資本主義：突厥斯坦產品、清朝的白銀與東方市場的誕生》)是西方新疆研究的一部新作。作者金光明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歷史學博士學位，現在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任教。金光明的學術興趣集中在東亞的帝國、邊疆和跨國研究上。

國內學界有關清代新疆的研究主要聚焦於民族關係、軍府制、邊疆治理政策與農業開發等主題。近年來，新清史、內亞史研究視角越來越受到學者關注，中國邊疆地區的研究和認識不斷地出現新的研究成果。金光明的研究正是在此學術背景下，利用和分析多語種歷史文獻資料，考察16世紀以來在全球貿易擴展背景下，新疆伯克與清朝的結盟過程，以及這種合作結盟促進的早期現代世界的互動和一致性。

有關本書的書評，目前可以檢索到兩篇英文書評和一篇中文豆瓣書訊。本文期望能夠對此書的各章內容進行較為全面的綜述，以期引起中文學界對本書的關注及其相關學術問題的進一步討論。

在緒論裡，金光明指出以往傅禮初(Joseph F. Fletcher)等學者對清代新疆的研究側重強調滿人的因素，而忽略內亞當地族群的能動性。本書聚焦於16至19世紀南疆的伯克，他們支持清廷進入的原因就是為了推動綠洲積極的轉型，以回應全球的商業擴張，逐漸在南疆綠洲形成「邊地資本主義」。作者指出，「邊地資本主義」是一種以盈利、商品化為導向的經濟模式，其特點就是大量的勞動力被用於具有明顯資本主義特徵的農業擴張活動，並且與當時全球擴張的商貿體系互聯互通，在全球貿易中謀求最大利潤，從而引起南疆地方經濟和社會的波動和重組。清廷的進入，不但為當地伯克帶來了庇護者，而且為當地市場注入白銀資本。本書展現早期現代帝國在內亞農業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從邊緣和地域的視角理解清朝在中亞地區的擴張，南疆地方資本主義轉型與印度等地類似，因此可以說這一事件是全球的共時現象，帝國與資本的互動結合並不是歐洲的獨特現象，本書因此挑戰「歐洲例外論」(European exceptionalism)的學術觀點。

全書正文分為五章，並有緒論和結語。在第一章中，作者考察16世紀全球貿易擴張下新疆地方精英合作對象的轉變，揭示他們從依賴明朝的朝貢貿易到建立和清朝的合作關係的歷程。作者認為，16世紀，在歐亞貿易環境的變化下，中亞的伊斯蘭教蘇菲派遷徙者逐漸對南疆的綠洲商品農業產生興趣，促使他們遷移到南疆地區定居。

葉爾羌汗國與明朝朝貢貿易的中斷，對新疆當地的社會經濟造成重大的影響。毗鄰哈密、吐魯番兩地的穆斯林紛紛遷徙到甘肅、青海等地，以便接近內地市場，尋求商機。但是準噶爾汗國勢力進入南疆，動搖了南疆綠洲經濟發展的人力基礎，進而影響伯克的利益，這促使部份伯克如額敏和卓傾向於尋求與清廷的合作。在1757年清軍平定準噶爾的軍事行動中，大量的軍需物資供應帶動新疆當地經濟的復蘇。作者認為，清朝與當地首領的合作結盟是導致清廷最終控制新疆要素之一。

第二章討論清朝控制南疆後，伯克精英管理地方的運作模式及其導致的地方經濟社會的大轉變。作者通過對伯克職位的分類分析，指出伯克主要負責三個方面的事務，即徵稅、維護和管理商業交通、促進農業和採礦生產，這三方面都是旨在盡可能地開發利用當地的稅收，因此可以說伯克管理層是商業性的。作者用南疆的兩個伯克貴族鄂對(Üdai)和鄂斯璠(Osman)的事例來闡釋這種地方管理模式下的綠洲經濟的大轉變。

鄂對因高樸案而受到牽連，但他驚人的財富與多元化的財富適用投資方式印證綠洲經濟的興旺發達。通過高度商品化的玉石開採、牲畜養殖、穀物種植，鄂對擁有豐富的財富。然而這一切都是藏於幕後的清朝所保障和給與的，無論是從投資機遇，還是壟斷當地市場考慮。事實上，當時南疆伯克濫制佔有土地、燕齊的現象十分普遍。他們貪婪地吸收資源，投入到綠洲農業生產中，致使南疆的土地開墾、財富和人口都提升到一個極高的水準；但同時，伯克卻逐步超越自己的許可權，侵吞了大量綠洲平民的土地，激化社會矛盾。作者認為未嚴懲鄂斯璠主要是由於清廷在南疆採取有別於內地的治理措施——伯克制，為了盡可能地減少管理成本，穩定地方統治，清廷扮演著當地伯克精英保護者的角色。

第三章是全書的核心部份，作者認為18世紀末清廷和浩罕皆排斥大小和卓後裔的勢力，他們因此被迫潛藏在清與浩罕之間西天山的深山之中，遷徙不定，部份失地的農民、逃走的燕齊以及沙漠的行商成為他們的追隨者和支持者。本書作者將這些人群稱之為「避難的邊緣人」。正是這些人為19世紀持續的和卓後裔發動的戰爭提供人力資源，並直接釀成19世紀20年代末的張

格爾叛亂。

作者指出，上一章所描繪的綠洲商品農業發展模式中，伯克擁有的耕地不斷擴展，侵佔公有土地和水資源，致使農民們失去土地，他們部份轉變為伯克的燕齊，部份逃到臨近的山上避難。無論如何，這一方面增加納稅農戶的負擔；另一方面增強西部山區中和卓後裔支持者的勢力，從而形成深刻的鄉村社會經濟危機。作者引用一個冒牌和卓後裔企圖騙取錢財的呼籲，反映出18世紀末南疆的城鄉差異——城鎮居民對此回應者寥寥，而鄉村居民回應較多。因此，作者認為張格爾叛亂實際上是南疆農村居民對西部城鎮伯克富有者的革命，而不是之前學者認為的宗教或民族主義的運動。

筆者認為，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受到魏源《聖武記》記載的影響，傳統的中國史家皆將和卓後裔張格爾的叛亂歸因於當時地方官員的腐敗無能；現代的歷史學者研究指出，極端宗教狂熱者的支援是和卓後裔能屢次掀起叛亂的社會基礎。金光明在本書中的研究則揭示出，在「清—伯克」聯盟中邊地資本主義的發展使部份民眾利益受損，他們逃離到山區，構成反叛力量的重要支持者，推進對這一問題的認識。

緊隨上一章，第四章揭示張格爾叛亂後南疆綠洲經濟的短暫繁榮。作為對19世紀30年代的張格爾與玉素甫叛亂的回應，清朝加強南疆的軍事化統治，伯克貴族成功地將這種軍事保護轉化為一種新的投資機會。通過協助南疆的屯田開發以及對沙漠行商的徵稅，伯克精英的經濟收益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同時，隨着屯田開發的推廣，伯克更多地直接面對遠離綠洲城鎮的鄉村居民，也更加直接面對鄉民的抵制。另一方面，叛亂中大量的稅戶外逃失蹤，農村勞動力缺乏，戰後鄉村穩定的重建使伯克更加依賴清軍的存在。但是，以伯克為主導的急速屯田擴張，激發失地農民和利益受損群體的反抗，進而迫使清廷委任伯克進入原來沒有直接統轄的鄉村地區。最終，快速的擴張超出清朝國家力量和軍事組織能夠控制的程度，到1840年以後東南沿海面臨西方各國侵擾時，形勢顯得尤為嚴峻。作者指出，正是由於軍事力量的缺席，使得鄉村穩定最終崩潰。

在最後一章中，作者從毛拉·穆薩·薩拉米(Mulla Musc Sayrami)對清帝國在新疆統治的衰落敘述入手，以1864年清廷中斷對新疆西部地區的物資、白銀供應為例，展示出清帝國在新疆統治的衰落更可以說是一個有全球意義的事件。1839至1842年的中英鴉片戰爭給新疆帶來巨大的影響，也影響到南疆和浩罕等周邊地區的貿易，使得自1850年代到1950年代近百年時間內繁盛的邊界貿易大幅下滑。內憂外患之下，清廷於1853年停止對新疆的協餉（白

銀)的輸入,使得新疆軍隊費用拮据,同時當地的市場缺乏結算的貴金屬貨幣。伯克嘗試解除危機,但無論是開採銅礦或壟斷銅製品流通都加重當地人的負擔。

1864年,清朝在新疆的統治崩潰後,當地綠洲高度商品化的資本主義經濟喪失發展的驅動力——清的軍事庇護和白銀資本的投入。但在19世紀70年代,新的全球性的區域商業聯繫正在形成,諳熟貿易的伯克開始向西方尋求貿易機會,主要是與浩罕國、俄羅斯諸城市與英屬印度建立貿易聯繫,通過棉花種植業的擴張與棉花貿易重建新疆的商業網絡。

結論部份,作者首先回顧新疆綠洲資本經濟興起的全球化背景,分析伯克貴族選擇與清帝國合作的重要原因是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同時,作者指出伯克和清朝的聯盟是富有策略性的,並且是不斷變化的。最後作者質疑長期以來學術界對現代化起源於歐洲的觀點,提出在歐亞內陸地區也存在着帝國擴張、世界貿易與商品性農業三者的互動發展。在此基礎上,作者試圖重建邊地綠洲資本主義發展與邊緣群體不斷抵制的互動發展過程,描繪出一幅與以往認知不甚相仿的歐亞大陸內部世界的圖景。

金光明所研究的邊地資本主義突出一種中亞世界的內部視角,對比分析莫臥兒帝國的柴明達爾(Zamindar)、奧斯曼帝國的阿揚(ayan)、清帝國的伯克之間存在高度的相似性,如他們都將新土地投入於商業種植(包括玉石、馬匹、牲畜、棉花與穀物等),憑藉私人權勢獲取資源,並造成與農村群體的衝突。這些分析無疑為反思清代邊疆社會史研究提供頗有價值的視角。綜合而言,此書確實是一部將南疆區域經濟社會史納入全球史研究範疇的佳作。美國學者濮德培(Peter C. Perdue)指出,此書是西方學術界第三波新疆研究浪潮中代表作之一,從當地族群的互動和經驗出發,採用跨族群、跨邊界的研究視角,不但討論南疆內部伯克、清朝勢力的發展,也從外部分析浩罕國、山地避難者與和卓後代之間的複雜關係,呈現出更廣闊的全球史面貌,為認識清代新疆歷史的走向提供不同的視角。

不過,本書還有一些不足之處。美國學者王國斌(R. Bin Wong)指出,金氏的研究把新疆當地的經濟發展與清帝國進入的過程聯繫起來,但是未能把清朝的軍事動員的財政特點與歐洲帝國進行比較,從而削弱討論這些帝國間相似特點的論證嚴密性。此外筆者認為,儘管金光明試圖論證清代南疆經濟獨有的全球性、重商主義特徵,即所謂的邊地資本主義,但他提供的許多資料清楚地表明,大多數土地和勞動力是由清政府通過直接的行政手段來調配的。從經濟學角度來看,金光明筆下的資本主義的因素並非亞當·斯密

(Adam Smith)一樣的自由放任的市場，而更類似於一種壟斷性質的邊地貿易形式。雖然他想要從世界市場形成的角度反思南疆的近代歷史，但毫無疑問，絕大多數當地的農產品的消費者是當地駐防的清軍，文中並未充份展示南疆與更廣闊的世界市場的聯繫。其次，金光明認為清代新疆的資本主義發展取得較高成就，遠距離貿易相當可觀。但從清代相關材料來看和浩罕、哈薩克等的貿易政治性更強，絹馬貿易等繁榮的時間相對短暫，數量也逐漸平穩回落。因此我們需要謹慎地對待清代新疆商業的發展規模和商品流通情況。金光明認為南疆地區發生的一系列和卓後裔的戰爭與社會矛盾和伯克的經濟活動有關，在社會矛盾的經濟成因裡，城鄉對叛亂回應的不同這一結論仍需要更充份的史料印證。最後，筆者認為本書中的觀點還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如書中第一章認為明朝朝貢貿易的中斷與葉爾羌汗國的衰落關係密切，筆者認為這一論斷缺乏足夠的史料支撐，文中並沒有全面分析朝貢貿易在葉爾羌汗國對外經濟貿易中比重，亦未分析葉爾羌汗國末期與明朝朝貢貿易的頻次和規模的變化。

趙佳文、張莉

陝西師範大學西部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

***Violence and Order on the Chengdu Plain: The Story of a Secret Brotherhood in Rural China.* By DI WA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260 pp.**

微觀史家將研究視角置於歷史進程中的小群體與個人，並以細微的研究對象入手而觀更為宏觀的歷史軌跡。王笛的 *Violence and Order on the Chengdu Plain: The Story of a Secret Brotherhood in Rural China, 1939-1949* 一書便是一部微觀史觀的論著，該書聚焦於1940年代成都平原裡的一個袍哥家庭——雷明遠之家，研究雷氏家庭的興起與衰落、他們的日常生活、以及與鄉村的聯繫等。作者更試圖從一個家庭的生命史延伸至1940年代前後整個川西平原的社會、經濟、政治等層面，從而進一步了解對四川地區影響最為深遠的秘密社會組織「袍哥」的發展與沒落。

本書除緒言外，共分為四個部份，內含12個章節。書中所圍繞的主要史料是沈寶媛所撰寫的社會調查——《一個農村社團家庭》。在緒言部份，作